

世纪
风
铃
丛
书



LIU TANG DE WEN HUA ZHI HE

HAI TIAN CHU BAN SHE

流淌的文化之河



流淌的文化之河

吕延涛 著
邹晓辛

海天出版社

流淌的文化之河

吕延涛 邹晓辛 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淌的文化之河/吕延涛, 邹晓辛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0. 9

(世纪风铃丛书)

ISBN 7-80654-254-X

I. 流… II. ①吕…②邹…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IV. K25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4776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ph.com>

责任编辑:薛惠文 封面设计:刘 辉

责任技编:陈 炯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 1 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9.375

字数:190 千 印数:1-1000 册

定价:18.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前 言	(1)
1、流淌的文化之河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漫笔	(5)
2、千古人物 如何评说 ——谈历史传记编著中的几个问题	(10)
3、善待传统	(18)
4、外国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	(22)
5、傲慢与偏见	(26)
6、传教士的西学活动与洋务派引进西学之比较	(30)
7、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42)
8、近代贵州反洋教斗争三十年	(57)
9、教徒·传教士·畸形儿 ——关于梁发的一生	(66)
10、汤若望案始末	(78)
11、田兴恕与《秘密公函》	(81)
12、艰难的第一步 ——论洋务时期中国工业运动的历史地位	(87)
13、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一奇观 ——论孙中山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	(103)

14、略论南北议和中的孙中山	(121)
15、历史的抉择 ——论孙中山等人早期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因	(134)
16、南北议和中的唐继尧与刘显世	(145)
17、丁宝楨与清末贵州盐政	(156)
18、略论抗战前后的贵州盐务	(165)
19、述论贵州苗族习俗中存留的古代社会遗迹	(180)
20、利玛竇	(200)
21、南怀仁	(205)
22、马礼逊	(209)
23、理雅各	(214)
24、丁韪良	(219)
25、林乐知	(224)
26、傅兰雅	(229)
27、李佳白	(233)
28、李提摩太	(237)
29、司徒雷登	(242)
30、“国中之国”与“文明绿洲”	(247)
31、价值观念必须更新	(252)
32、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祭	(255)
33、史学大师与史学繁荣	(261)
34、基督教的传播与近代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变迁	(275)
35、文化的断流	(288)
后 记	(291)

前言

约十年前，吕延涛、邹晓辛出版了《龙与十字架》一书，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今天，两位作者又将推出《流淌的文化之河》一书。在洋洋洒洒二十余万字当中，从文章的内容上看，多属近代史方面，其中又以基督教会史类文章居多，还有一些贵州近代史和评价历史人物方面的文章，内容颇为丰富。如果说，《龙与十字架》是在近代殖民主义者变中国为殖民地这样的大背景下，较多地记述了在华基督教会底层的历史，对普通传教士和普通教徒生活着笔较多，那么，《流淌的文化之河》则对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作了专题研究，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学术氛围更加浓郁。

两位作者十多年来反复研究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及影响，这是因为作者充分认识到由于西教的传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诸多影响，如科学技术的传播，医院、学校等慈善事业的

兴办，以及由于西教的传入加剧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等等。近代历史上，有许多传教士是负有殖民活动的使命来到中国，有的还成了殖民者侵略中国的工具和帮凶。但是，基督教的传入，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传教士的好与坏、善与恶，需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给出结论。例如，近代最早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曾经受聘于澳门东印度公司。他在给伦敦商会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这件事，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发现传教士是准备着为公司的利益服务的。”很显然，他一开始就和殖民机构挂上了钩。然而，马礼逊在华期间，主要还是致力于沟通中英关系。他受命来华时，伦敦商会给他的任务是：一是找一个机会担任数学家的职务，进行教学，也可以讲授英语；二是在广州住下来，学会汉语；三是编一本汉英字典；四是翻译《圣经》。马礼逊没有忘记他的使命，很快学会了汉语，并编出《华英字典》六大本。同时他还把《圣经》译成中文，在广州和马六甲印行。马礼逊的这些活动，客观上对中英文化交流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像马礼逊这样的传教士，如果简单地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是有失客观的。

至于基督教徒，也不能一概称之为洋奴买办。例如近代最早接受洗礼的新教徒之一——梁发，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作者称他是个“畸形儿”。梁发和他的《劝世良言》都是“畸形”的，可以说他的思想是不中不西、中西混杂的。毫无疑问，梁发写《劝世良言》，目的是宣传一种宗教，但由于局限于文化水平和对《圣经》的理解，《劝世良言》只是摘引《圣经》的某些内容加以中国化，或者用儒家的语言加以说明。作为一本宣传宗教的书，内容自然有许多消极因素。但梁发作为一个深受儒教熏染的中国人，写出《劝世良言》这样的书来，

本身就是对儒教的一种挑战。梁发把他所推崇的“皇上帝”标为“万国之王、万国之主”，自国王到庶民“皆在其掌握之中”。这样一个“皇上帝”，既可以用来对付正统的儒教，也可以用来鞭挞清统治者的独裁和专制。宗教并不一定在任何时候都是鸦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用一种宗教去冲击另一种宗教。梁发的说教，至少对禁锢人民思想的儒教进行了冲击。而在冲击中猛醒的人们，他们的历史取向又往往不受某种宗教势力的制约。太平天国革命接受《劝世良言》的某些说教，树立了一个“天父皇上帝”，以平等思想作武器，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然而，这场战争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以抗击外来侵略为己任，并不是以建立和传播某种宗教为目标。

不过，在近代中国，外国传教士的活动是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活动分不开的。在侵略者发动对华战争问题上，许多传教士都抱着积极的态度。一些传教士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认为时候已经到来，“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了”。有些传教士还充当间谍，为殖民者搜集情报，刺探军情，有的则参加了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作者在着重研究传教士来华的影响和作用的同时，还对近代史上的一些人物进行研究，其中仍以传教士和外籍在华的文化人为主。本书内容上见长于传教士和近代中国的关系，见长于记述中西文化撞击的波浪，见长于对中西关系的探究。同时，对近代史上的一些关键人物，如孙中山等也有所涉猎。是一部内容广泛，有学术深度和思想深度的书，它的出版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本书作者之一吕延涛曾经是我在《光明日报》时的同事，

他的许多论著都是在繁忙的工作之外利用业余时间写成的。邹晓辛也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她思想敏锐，对许多学术问题有自己的见解。两位作者的共同特点是文笔清新晓畅，文章有较强的可读性。他们目前的工作单位，都不是专门的历史研究机构，但他们对历史科学的热爱不改初衷，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还不时写点历史方面的文章，且多有建树。作为他们的朋友，我衷心祝贺《流淌的文化之河》的出版，并期望他们在今后几年再有新的史著出版。

苏双碧

流淌的文化之河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漫笔

1840年以后，中西文化间的天幕开启了，文化的沟通步入了新的天地。但是西学之水还要穿越一片片人为的高地，要经过漫长的岁月方哺育出新苗。

(一)

谁来做开河引水之人呢？

近代历史开始时，面对浮海而来的红发碧眼的洋人，人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做什么？那一年林则徐站在虎门炮台上，看着洋面上轰然行进的英国军舰，正是抱着这样的焦虑，他在仓促间编成的《四洲志》，是近代最早的一本由中国人编写的有关西方的书。《四洲志》中大量采用了在华西方传教士提供的材料。

历史把传教士推到了前台。引进和输入文化，语言是第一关。在华传教士既通西语，又通华语，是当时唯一可用的翻译人才。实际上，自明末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就一直拉扯着中西文化间纤细的绳索。林则徐当初就是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编辑的《中国丛报》等书刊中了解西方的。

中国人自己真正着手有组织输入西学是在六十年代。1862年，设立京师同文馆，请洋人教西语、教翻译，是清政府引西学之水来滋润中国土地的开始。同文馆教习大都是洋人，其中最有名的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稍后几年，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设立江南制造局（内有翻译馆），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等，着重翻译西书。当时译书一般由洋人担任口译，中国学者笔录，完后再由双方润色定稿付印。那时担任口译的洋人主要有林乐知、傅兰雅、伟烈亚力等人，担任笔译的有近代著名科学家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父子等。在甲午战争前，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与广学会，并称输入西学的“三驾马车”。

甲午年是个分水岭，这以后，一方面同文馆的毕业生已小有规模，留学西方的学生也陆续归来；另一方面，甲午以后出现了留学日本的热潮，到二十世纪初叶达数万人，他们很快便成长起来，壮大了译书的队伍，传教士逐渐被留学生所代替。甲午以后西学的大规模输入，是由留学生完成的，短短几年里，出现了一批新的译书出版机构，像强学书局、大同译书局、东亚译书局等等。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甲午战后20余年的西学东渐的功绩远远超过战前数十年。

学校教育也是一条输入西学的渠道，其特点是文化向深层次渗透。遗憾的是新式教育发展缓慢。

(二)

现在让我们顺着西学东渐延伸的轨迹，看看东流而来的文化之河给中国带来些什么？历史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896年，梁启超遥对灰飞烟灭的北洋舰队，清醒地说道：西人所强者在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近代士人用了五十年时间方认识到这一点。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列出354种西书；加上广学会到十九世纪末出版的246种图书，教会学校译书、私人译书，构成了甲午战争前西学东渐的基本格局。那时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还停留在船坚炮利的层次，因此所译之书大都与造船造炮有关。可以说，几十年里，西学东渐主要是为洋务事业服务的，实际上它也的确成为洋务事业的重要支柱。

甲午一战，北洋海军沉入大海，洋务破产了。人们猛醒过来，才发现走入了误区，因此甲午战后，输入西学之风陡然一变。首先表现在有关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史地的书籍成为热门货。京师同文馆主要翻译出版西方法律类书籍，广学会出版了一些西方史地政治类图书。像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林乐知的《中东纪事本末》都是这个时期出版的。梁启超曾说：“《泰西新史揽要》述近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几年后活跃一时的戊戌诸君子正是从这些书中找到思想武器的。

甲午战后的另一个变化是政治、经济、史地类译著大量出版，质量也提高了。这里必须提到留英学生严复，他翻译的《天演论》一出版，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天演论》首次将盛行于西方的达尔文进化论介绍了进来，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比

如鲁迅、毛泽东等。以后又有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书，经严复之手传遍千万人。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成为可用之才，随之大量的西方科学及日本化了的西学流入中国。一时间在日本和国内出现了众多有关西学的杂志和报纸，如《浙江潮》、《游学编译》、《二十世纪之支那》、《新民丛报》、《民报》、《苏报》等等，这些报刊旨在介绍西学知识，宣扬民主革命、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在推进民主革命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酝酿诞生的。从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来说，输入西学的功劳在东洋而不在西洋。

(三)

当初在近代化进程的起跑线上，中国还稍稍领先日本，至少不能说落后。明治维新时日本西学的积累大多来自中国。然而，三十年不到，中国与日本颠了个个儿，真是应了那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十年代，当洋务派正在做坚船利炮梦时，日本天皇就已经把“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的话写进了谕旨，将西学看作立国的基础。此后输入西学的运动很快在日本全面铺开，从西方及中国翻译了大量的西学著作。那些好的西学著作在中国刚出版，立即就被译成日文，并且远远超过了在中国的影响。如丁韪良译《万国公法》，京师同文馆印了300本，在中国已是破天荒地受重视了。第二年，《万国公法》传入日本，在后来几十年里不断重印，仅注释本就有好几种，其变本则成为中小学教材。日本还不断派出留学生、聘请西方专家，以求对西方全面了解和学习，并特别

注意对西学的研究和吸收，从而奠定了日本在短期内腾飞的基础。明治维新后没有几年，日本即全面推行义务教育制度，把西学知识推至民间，形成了深厚的基础。相比之下，同一时期流入中国的西学之水既狭窄又浮浅。由此看来，中日间师生关系的错位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的一面。

百年过去，文化之河长流常新，但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一幕里，有许多故事仍令人难忘，发人深思。

千古人物，如何评说

——谈历史传记编著中的几个问题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374页）因此，历史人物的传记及其评价，一直是历史学研究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出版的各类历史传记（不含文学传记）近千种，这个数字反映了历史传记写作的总体成就。其中很多优秀的历史传记在向广大读者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国情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对近年来的历史传记进行粗略梳理之后，我们感到有些问题值得思考和探讨，现发表于此，愿求教于方家。

一、历史的真实与想象

一部历史传记出版之后，往往听到这样的提问：“这个故

事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疑虑的存在，恐怕主要是对立传原则的认识，即怎样对待历史传记写作的“真实”。

立传中必须坚持历史真实，以严肃科学的态度完成写作，这是众口一辞的原则。这里所说的历史真实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表象真实。比如一个历史人物衣食住行的生活环境，以及人物的生卒年月、体貌、经历等等，皆属于这一层次的要求。一般来说，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还是不难做到的。二是历史真实还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探求，即反映一个时期的精神风貌和思想观念。作为一部历史传记，则应真实、准确地反映该人物精神、心理上的活动。这一点是很难把握的，可以说是历史传记写作的难点。因为有时仅仅依靠历史资料是无法复原传主神韵的。所以，为了写出真实的历史人物，许多传记作者都在苦苦地求索。有的作者为了追求历史的真实，片面强调“无一事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把一个个历史人物写成千人一面干瘪的形象，令人难以卒读；有的作者强调“艺术的真实”，采取历史为我所有的态度，以至任意编造、歪曲历史，出现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笑话和谬误。这两种倾向都是不足取的。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依然存在，给历史传记的写作带来消极的影响。

孔子曾面对流水发出这样的叹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历史也是这样流去，永远无法再现。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照相机、收录机、摄像机，也无法尽现历史原貌；况且与浩大的历史进程相比，纵有多少资料也只能算是片言只语，不可能完全反映历史的变迁和人物的命运。然而，作为一部优秀的历史传记，必须勾画出人物的神韵来，这真是摆在历史传记作者面前的一道难解的题。

怎样才能做到既忠实于历史，又能写出栩栩如生的历史人

物呢？我们认为，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还要靠认真的揣摩、合理的想象去完成。这里所说的揣摩、想象，是通过缜密的考证研究，结合时代、环境及人物特性对史料中缺少的部分的补充，是研究心得的再现，这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在描述心的历程这一层面上，历史真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合理想象的。《史记》就是成功的例证。无论是宏观的战争场面还是人物细节的描述，司马迁都写得那么真实、生动。《史记》有两处写到老鼠，一是李斯由于见到“厕中鼠”与“仓中鼠”生活的差异，决心追名逐利，虽显赫一时，却未得好死。二是写张汤年少时对鼠偷肉的审理，说明其办案能力，终成为“酷吏”。这样的细节，只能是“传闻揣度而得”。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说得好：“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里讲的“揣度”、“揣摩”、“悬想”，是指“入情合理”的想象。当然，历史传记的写作是不能离开真人真事对史料进行综合与虚构，它必须立足于真人真事，其想象不应是随意的，而是有个“度”。这个“度”就是在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对历史人物人情的“遥体”，对历史事件事势的“悬想”。历史传记作者正是由于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才能写出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和内心活动，使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

二、人物与时代

写人就要写时代，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之中，其言行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即使伟大的人物也只能在时代提